

## 第五章 台中市派系、政黨與選舉的經驗分析

派系與政黨在台灣政治發展史上，長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派系的產生與運作，有其頗為複雜的心理、社會、文化、地理、經濟與政治等因素。它們的主要共同目標是爭取或維持政治權力，派系的運作只是為達此目標的結盟行為，派系領導者或成員共同的結盟行為，在選舉過程中，最大的力量乃是來自以關係取向（relation orientation）為主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基礎（趙永茂，1989：59）。透過這種關係取向為基礎，派系不論是在選舉前的爭取政黨提名及選舉中的動員展現，均能發揮一定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力量。台灣社會結構快速的轉型，地方派系的選舉動員基礎逐漸由緊密穩定走向鬆動解構。許多地區派系網絡的選舉動員能力減弱，以及派系候選人得票率漸為下降的趨勢即是社會變遷對地方派系運作衝擊的明顯例證。1970年代國民黨為遏止地方派系勢力的坐大，嘗試採取各種策略以壓制地方派系在選舉政治中的重要性。因此地方派系亦運用各式辦法以強化或者維繫本身的影響力，甚至依附於政治反對勢力，與國民黨進行抗爭，這種亦敵亦友，既合作又競爭的錯綜複雜結盟型態，在候選人甄選過程中時常出現（吳重禮，1998：178）。

政治機器的動員網絡主要是依據彼此間地緣、血緣、親緣、學緣等關係所建構而成。社會網絡動員主要是藉由各種社會人際關係來傳遞政治訊息，並且試圖說服對方支持某些政黨或候選人。因此選舉時的動員過程往往與當地社會人際關係密切，也就是考驗社會關係的程度，畢竟個人的投票抉擇或政治參與的行為不單純為個人獨立決定，往往受到社會網絡所影響。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不論是否擁有政黨或派系背景，皆會竭盡所能的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網絡來獲取勝選的選票。政黨結合派系所提名與支持的候選人可藉由派系領導或派下成員的人際關係網絡聯繫，以突破個人的關係網絡限制，因此每逢選舉，就是社會網絡的大規模動員。故地方層級的選舉，通常會透過其所依附之政治體系的網絡來動員選民，主要由「樁腳」以各種不同的型態與面貌來接觸選民，甚至會透過金錢或物質之報酬為媒介來指引選民的投票

目標。

國民黨以往運用選舉機制來吸納本土政治菁英，進而與地方派系建立侍從體制，另外，由於國民黨本身無法統治與其毫無淵源的社會人際網絡，因此運用侍從關係來維繫政黨與派系之間的聯盟架構；國民黨憑恃著全面掌控的政治特權、安全系統與社經利益來籠絡本土政治菁英與地方派系，以特許利益交換他們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然而隨著國民黨中央政權的逐漸旁落，喪失特殊利益分配權的政治現實，致使酬庸派系的大餅不復存在，而派系也面臨傳統人際網絡的斷層與派系網絡之鬆動所導致的動員能力衰退。政黨輪替的變遷產生若干派系成員恩主轉換的現象，派系與政黨對選舉的影響力變化，自然引發派系對政黨支持的微妙改變。特別是在以地方派系人際情誼網絡與社會關係網絡為動員主體的基層選舉，政黨支持和派系背景在選舉的過程中，對於候選人的得票率會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為深入分析 2000 年中央政黨輪替前後，台中市地方基層的市議員選舉，派系與政黨對候選人得票率的相對影響力，以及比較派系與政黨在選舉中，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程度。本章藉由多元迴歸分析，以 2000 總統大選為分界點，評估 1998 年與 2002 年政黨輪替前後，台中市第十四屆與第十五屆市議員選舉，候選人是否具有派系背景或政黨背景，對候選人得票率所產生的影響。

## 第一節 派系與政黨關係之變遷

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所採用的統治策略有密切關係。國民黨一方面在中央採取嚴格的權力壟斷，封鎖本土菁英份子的政治參與，打擊與監控企圖串連的任何政治勢力；另一方面在地方層次開放基層選舉，鋪設民主選舉的門面並達到抒解本土性政治能量的雙重效果。國民黨為避免派系勢力坐大，通常使用分而治之的方式，同時扶植一個以上的派系，維持著彼此競爭、互有輸贏的平衡模式；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整合縣市級以下的地方政經資源，於是從農田水利會到基層信用合作社，都被由地方黨部主控的選舉樁腳一手掌握，再透過縣市議會及基層民代，構成一個複雜網絡型態的利益資源分配系統。不過在地方政治場域中仍無明顯政黨對峙的時代裡，地方派系有時往往扮演與替代了某些政黨功能，如【表 5-1-1】所示。

【表 5-1-1】：地方派系、政黨與壓力團體之比較

項目	地方黨部	地方派系	地方壓力團體
基本組織份子	政黨有工作人員及地方知名有力人士	地方上有力人士	利害一致的人
組織（法規）	有	沒有	沒有
目標	有一定的黨綱政策，以獲取政權為目標	以利害為主，沒有政策，但有主張，有掌握地方政治的企圖	以利害為目標
存在條件	需有群眾基礎	需有群眾基礎	需有群眾基礎
結合基礎	以黨的主義、政策、組織、黨綱為結合基礎	意氣相投或利害一致，合則留，不合則走	利害一致，個人關係
爭權方式	選舉	選舉	握有選票
領導中心	以黨為領導中心	靠個人關係	靠個人關係或掮客護航者
活動方式	半公開	半公開	半公開
活動次數	經常有，選舉時活動加強	偶爾有，選舉時活動加強	需要時才有
持久性	有組織故持久	沒有有形組織，隨人而變	隨利害消失而消失
黨與派系關係	不喜歡派系，但往往為求勝選而利用現有派系勢力	依派系以自恃，藉黨以求晉身權位與利益	利用黨派達成願望，黨派則利用壓力團體得到選票
政治上的作用	遵照黨的政策旨意時則有力，為地方勢力包圍利用時則與地方派系無異	議會沒有其他第三政黨存在時，或可以派系取代政黨部分功能	過則有腐蝕政治作用

資料來源：陳陽德，臺灣地方民選領導人物的變動，台北：四季出版，1981年4月，頁150-151。

國民黨與地方派系間的利益資源系統分配了台灣地方資源數十年，然因為政經環境的改變，此系統產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邏輯重新調整，中央民意代表的參選開放，打破過去縣市長為地方派系爭奪最高據點的狀況；其次是政治環境逐步透明化，反對黨的監督效力增加，以及政治理念的大量宣傳，舊有的樁腳系統相對地日漸疲弱；第三是國民黨本身內部鬥爭不斷，多次主流與非主流的衝擊內耗，使得地方黨部組織與民眾服務社系統都面臨分裂危機，昔日能有效操作選舉票源的能力自然每況愈下(見【表 5-1-2】)；第四是特許行業競爭力下滑，在開放的自由市場環境裡，農會信用部與信合社迅速失去優勢，連帶使依附其中的派系實力隨而下降；第五是民進黨籍縣市長很多非派系出身，因此採取刻意與派系保持距離的做法，派系無法再從行政體系取得豐沛資源，實力久而萎之。這些因素都衝擊到地方派系在平日匯集地方政治人才的效度與未來選舉時所能爆發能量的程度。

【表 5-1-2】：1989-2002 年國民黨黨內四次分裂

西元	主流勢力	非主流勢力	結果
1992	李登輝等	新國家連線成員	1993 年出走後成立新黨，1995 年新黨旋風占第三屆立法委員 20% 的席次，2001 年卻無法跨過 5% 門檻
1996	李登輝、連戰等	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等	李連大選共贏得 54% 選票，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選後淡出政壇
2000	李登輝、連戰等	宋楚瑜與部分省府團隊等	陳水扁贏得總統，宋楚瑜得 36.84% 支持率並成立親民黨；2000 年連戰任國民黨主席並進行黨改造
2001	連戰與中生代改革派人士等	李登輝與親李系人馬等	李受黨紀處分，但其結合原本勢力與本土派人士，於 2001 年組台灣團結聯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在國民黨解除黨禁伊始，原本競爭的地方派系多了選擇政黨的權力，隸屬於國民黨與黨外兩方勢力的地方派系，自此就可以擁有不同恩主的選擇，甚至進行全部或部分成員的政黨轉換，迫使政黨必須開始改變對待地方派系的方式，政黨由原有的控制、互信互惠情形，轉成理念招降與利益拉攏。例如台中市的張派與賴派因派系成長過程與國民黨息息相關，遂成為國民黨政權的擁護者；而何派長期處於對抗威權的角度，以致在民進黨成立後，隸屬

民進黨忠貞的支持者。2000年國民黨分裂，張、賴兩派領導人皆以連戰為首，但張派重要大將郭晏生與具賴派色彩的立委沈智慧轉移入宋楚瑜麾下，形成地方派系內的恩主轉換，代表著台中市地方派系成員間的自主性與政治選擇性不受派系所緊密控制。目前身為賴派要角的受訪者 T6 表示：

「2000年總統大選連宋分裂對台中市的地方派系沒什麼影響，派系比較不管這個，國民黨、親民黨兩黨是上頭在鬥，我們下面是管不著也不會管的，因為地方派系是比較草根性的。不過當然樂意見到泛藍合作，我想現在合作是可行，合併就困難了。」

國民黨早期屬於一黨獨大的政黨，政黨勢力全盛時期，在地方基層上政黨機器的運作能量大於地方派系，以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現實而言，黨部所提報的候選人，就一定能當選；也就是派系人物的參選要經由國民黨的同意，此時期台中市之地方派系正處於起步的階段，連地方黨部主委之職甚至比一縣之長還大。由於地方派系勢力尚未壯大，必須依附在政黨的羽翼之下，因而也願意服從於政黨，以台中市長歷屆選舉的候選人背景分析，這階段只有何派的創始人何春木敢與國民黨長期對抗。正因地方派系的依附，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主要策略是：一方面承認派系，另一方面調和派系。對政治職位採取平衡原則，所以在台中市長、市議會正副議長與市議員等公職候選人的提名過程，仍相當考量派系力量。此即是執政黨同時控制兩個派系，以防止派系過渡膨脹與持續維持政權的統治地位之方式。

地方派系成長至有若干實力的時候，地方派系和政黨關係就處在一個平衡地位，雙方相互依賴，執政黨要靠地方派系來維持執政的地位，地方派系也需要政黨的支持與輔選，此時進入合作共存時期，意即：由於地方派系掌握社會基層選舉所需的人際網絡，但在選舉階段動員之能量暴增的過程中，尚須包括國民黨所掌握之特殊機動選票的配合（黃復興黨部），以及實際物質報償的能力，否則地方派系單憑本身的動員能力恐是難以勝選。

派系雖與政黨結合，但彼此對選舉的立場，卻有各自的盤算。假使兩者的共同目標一致時，則兩者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但兩者衝突時，後果則與之相反，1960至1970年代的台中市長選舉，正是張、賴兩派與國民黨三者

間的傾軋紛爭、表露無遺的時刻。

1980年代的台中市議會是最明顯的派系茁壯時期，地方派系與政黨之間的關係產生微妙轉變。由於地方派系是情感的結合，長期以來選舉的諸多恩怨，使得張賴兩派彼此間鬥爭日趨激烈，政黨成為派系間操作合縱連橫策略的主要目標。此時期地方派系雖然處在紛亂的對立階段，政黨卻仍然對地方派系保有控制力量，尤其是使用「棒子與蘿蔔」的手段，即為特務機關與提名控制的兩樣法寶。特務機關與司法體系在黨國體制上，具有強有力的恫嚇警告效果；提名控制與輔選動員則主要是對派系加強政黨意識，讓派系成員瞭解到不僅要對派系忠貞，尚要考量到政黨的立場。

【表 5-1-3】：台中市人口籍貫分佈比例（1990 年普查）

地區別	總實數	台閩籍		外省籍		外國籍	
		實數	百分比	實數	百分比	實數	百分比
台灣地區	20,285,626	17,608,990	86.8	2,645,261	13.0	31,212	0.2
台灣省	16,145,036	14,394,933	89.2	1,738,099	10.8	11,902	0.1
台中市	772,828	655,683	84.8	114,493	14.8	2,641	0.3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1992 年 11 月 28 日報導內政部戶政司資料，本研究自行整理。

隨著 1990 年代政治透明化，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皆漸失去獨領風騷的舞台。國民黨遷台數十年間的特種黨部動員系統凋零，此時期台中市的人口結構，外省族群約僅剩一成左右的比例，相對於民進黨的街頭大規模社會運動，特種黨部更顯得勢單力薄（見【表 5-1-3】），再加上責任政治與政黨政治觀念的蓬勃興起，投票取向中的政黨選項，已成功瓦解地方派系成為選民投票行為的考量依據。綜觀學者的研究，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和政見取向（issue orientation）等是影響投票行為的重要三因素，對於選民是否投票或投票取向的影響力，政黨認同是影響投票行為一個穩定且長期存在（long-term）的重要因素<sup>1</sup>。

<sup>1</sup> 從孩童開始就透過家庭父母的社會化，漸形塑出對於某政黨的認同。父母對於政黨的偏好越一致，則子女在其往後人生越有可能具有相同政黨偏好。以美國經驗研究出現，子女

由於政黨提名時必須強調黨紀的維持與貫徹，地方派系為了自身的權力以及保有特殊的地位，有時不惜和政黨對抗而自行參選，如此一來，選舉結果往往會產生政黨與派系兩敗俱傷的局面。政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對於執意要參選到底者，甚至是抱持不惜「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地方派系人物，政黨乃以退黨之嚴厲處分處罰違紀參選者。縱然目前有不少是用先退黨參選，當選後再入黨的方式回應政黨的黨紀處分，但對地方派系而言，失去政黨的奧援，是必須甘冒著落選之風險。

台中市是一個都市化程度很高的消費型大都會，人際疏離感日增，外來人口的激增已淡化地方派系所憑恃的傳統人際網絡，台中都會性格的特性與經濟環境的困境，讓張賴兩派在地方政治的影響力快速削弱，縱使如此，地方派系在政經領域仍保有基本的號召力。長期依附於國民黨的張、賴兩派與民進黨的何派，在1997年民進黨籍市長張溫鷹執政四年後，與民進黨之間的關係並無改變。

雖然地方派系與地方執政者有相互密切關係，但張賴兩派整體並未出現西瓜效應而傾向民進黨。訪談結果發現，首先是張溫鷹本身既有娘家張派背景與夫家賴派色彩及黨內何派支持，在張溫鷹原與三派系相互交好的同時，為保持關係平衡，張氏就任市長後並不想再積極吸納更多派系勢力，所以地方派系未因張溫鷹的上任而得到更多利益。其次是傾向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在台中市基層扎根甚久，和支持民進黨的社團長期互別苗頭，因此在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的差異下，張氏無法與傳統地方派系進一步融合。第三是當初支持張溫鷹參選市長的地方人士並未因張氏的執政而獲得好處，造成張溫鷹不僅和國民黨地方派系及民代距離越遠，甚至與民進黨分道揚鑣，民進黨籍地方民代在失望之餘，更將未來希望寄託於蔡明憲身上，黨內權力鬥爭迭起之際，更難以齊心全力地向外擴張。最後是張溫鷹在推行地方建設與各項公共

---

的政黨認同與父母有相當高的關連性，子女往往會延續父母的政黨認同。同時也有不少人是因為文化、經濟、社會地位而對某一政黨產生認同感，進而在選舉時作為投票的考量，一旦認同感形成，就不易改變，是具有長期的穩定性。

工程時，自然引發市民的埋怨與不滿，諸如強制拆除違建等政策，卻無民意代表為其強力辯護，形成地方上一股倒張的力量，這股反對勢力延伸成為反對民進黨執政的情緒，自然會導致一股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之民進黨籍首長只能做四年的觀感，阻礙了地方派系與民進黨的互動關係。以上四項因素的催化，致使台中市傳統張、賴兩派的地方派系在中央政黨輪替後並未發生轉向民進黨的現象。

依據文獻資料與訪談結果得知，台中市地方派系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後，以派系的政黨動向而言，確實可以發現如學者趙永茂（2001b：164）研究所得之情形：台中市亦與其他縣市相同，在總統大選期間支持宋楚瑜者，選後就有加入親民黨的傾向發生。總統大選時，張派大將、前市議會議長郭晏生與具賴派色彩的立委沈智慧公開表達支持宋楚瑜的態度，而張派創始人張啟仲與賴派主要領導者賴誠吉等人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連戰；台中市地方派系因 2000 年總統選舉，國民黨的黨內分裂而導致張、賴兩個地方派系的部分成員政黨位移與各自獨立。不過從 2002 年市議員選舉中觀察，除無黨籍外，國民黨籍市議員仍鮮少發生政黨轉移，頂多為私底下支持親民黨，其偏向支持原因大多是選區內的選民多為外省族群且支持親民黨或宋楚瑜，候選人必須為選票考量而改變色彩或屬性。但是具有派系背景的國民黨籍市議員台面上則並未發生轉向親民黨的現象，國民黨依舊是台中市地方派系最大恩主的地位並未動搖，正如學者高永光（2002：1-9）所研究，因政黨輪替的時間僅兩年，且頻率不高，「恩主轉換」現象僅是初期的反應，致未明顯的「位移」。

2000 年以來造成台中市選民與地方派系對政黨支持變遷的原因，主要是「宋楚瑜效應」衝擊著長期受國民黨、民進黨所控制的地方政黨勢力。據訪談研究分析，台中市的宋楚瑜支持者大致分為六種：一、以外省籍為主，長期不滿民進黨台獨立場與國民黨統獨立場不明確的選民，具有些許中國情結的榮民、軍眷村成員等，目前在台中市人口結構比例佔有約一成左右。二、痛恨國民黨黑金形象與對民進黨仍有治國疑慮的中產階級和高學歷份子，甚



至一些為長期反對李登輝者，其大多懷有安定中求進步、對未來充滿期許的心態。三、一部份著眼於國民黨和派系內升遷無望或無法獲取政經利益，及政黨理念親宋楚瑜的國民黨黨工及地方派系成員。四、居住於台中市的省府員工及其眷屬，由於中市長期為省府的門戶，省政府在此地具有十足的邊際影響力。五、在精省過程中，見宋楚瑜被國、民兩黨刻意封殺下，純粹同情宋楚瑜者。六、以往宋楚瑜任職省長時，深受其恩惠者。尤其是宋楚瑜藉由任省長時，為擴展基層實力與人際網絡，帶領省府團隊勤於主動下鄉關懷、補助地方公共建設等積極與地方建立起直接的橋樑，給予台中市選民良好的勤政愛民印象。2000年總統大選宋楚瑜的得票率狂掃中市41.37%，其不僅擁有龐大的樁腳關係網絡與友好的國、民兩黨政治人物，更成功結合本省籍與外省籍選民的大量支持，尤其更併吞了新黨在台中市的外省籍選票，所以選區較多外省籍選票的市議員候選人，基於獲取選票的考量，其色彩較偏向親民黨。親民黨籍立法委員 T1 表示：

「國民黨有些議員傾向支持親民黨是因為國民黨與親民黨本質相同，水火同源，兩黨意識型態也相近，自然是有可能的發生轉變。對我而言，中產階級有很多支持者，他們希望安定穩定的政治。還有的原因是選票，票在哪裡，自然會影響政治人物對政黨的態度。」

至於家族長期從政的國民黨籍中生代市議員 T5 與 T6 分別表示：

「政治人物會轉變政黨喜好，純粹是選民結構的問題，另外還有宋楚瑜的個人魅力。一般而言，大選支持他的可以去親民黨當黨國大老，但是留在國民黨論資歷、輩份是排不到隊的。」  
「國民黨民代會偏向親民黨都是為了眷村選票的考量，說穿了，還不就是金錢和選票兩樣。另外，聽說如果在大陸有投資事業的話，也都會找親民黨立委來幫忙。」

由以上分析可得知，在面子、情感、省籍、選票、恩惠、政治理念與權力和利益等諸多條件下，形成了台中市地方山頭與派系人物發生政黨變動的主要原因。然而台中市在既有地方派系兩黨化的現象下，隨著親民黨的成立，卻尚無邁向三黨化的可能，因為現階段的選民結構中，親民黨雖然支持者眾多，但黨員人數依舊未大幅成長；再加上目前加入親民黨的地方政治人物皆非地方派系重要領袖，因此目前台中市傳統地方派系並未轉變成三黨化的現象，仍維持國民黨張、賴兩派與民進黨何派兩黨化的局面。

## 第二節 派系、政黨與選舉關係的模型設計

###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台中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實際模型之自變數為派系與政黨，而依變數為候選人得票率。模型基本假設如後：

假設一：中央政黨輪替前，候選人具有派系或政黨背景者，得票率越高。

假設二：中央政黨輪替後，政黨或派系背景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轉弱。

假設三：政黨的影響力大於派系的影響力。

其中派系和政黨之認定係以相關文獻的交叉比對與分析，搭配訪談資料的多次校對，進而提高本研究的兩個自變數之精準度<sup>2</sup>（參閱【附件四】、【附件五】）。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是欲以實證數據反映出派系及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故在本研究中存在派系及政黨兩個自變數的情形下，本章選定以多元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多元迴歸模型曾被諸多研究建立用以瞭解多個變項對於特定依變項的解釋力，如：張茂桂、陳俊傑（1986）在「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之關係」所做的研究設計，以派系競爭化程度與都市化程度為自變項，求得兩者對於投票率之影響；黃德福（1994）在「現代化、選舉競爭與地方派系：一九九二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所做的研究設計，以鄉鎮市區為基本分析單位，探求現代化程度與選舉競爭程度對於地方派系得票率之影響；高永光（1995）在「台灣選舉中之不比例性的分析-八十三年地方自治大選之個案研究」中，以選區規模與政黨得票率為自變項，分析兩者對於政黨席次率的影響等相關研究。

---

<sup>2</sup> 附件四與附件五所含之資料，在地方派系部分，僅取傳統派系之張派、賴派與何派三派為分析對象。

## 二、定義變數與模型建構

基於從估計一般線型模式  $Y = b X + e$  中的母數向量  $b$  的觀點來看，多元迴歸和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簡稱 ANOVA)，相似性的基礎在於二者都有機會在設計矩陣  $X$  時使用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 (黃俊英, 2000: 21)。在 ANOVA 的所有自變數皆屬類別或名目尺度，而依變數為區間尺度或比率尺度時，可用一般型式來說明：

$$Y = a + b_1 X_1 + b_2 X_2 + \dots + b_m X_m + e$$

(計量)      (名目)

而多元迴歸的一般型式雖為：

$$Y = a + b_1 X_1 + b_2 X_2 + \dots + b_m X_m + e$$

(計量)      (計量)

但在進行多元迴歸時預測變數如不是區間或比率尺度，而是名目尺度 (名義變數) 之非計量性資料時，應利用虛擬變數多元迴歸模式來處理，即預測變數必須轉換成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以 0 或 1 代表。本研究之預測變數為派系、政黨，屬名目尺度；而準則變數為候選人得票率，屬比率尺度。因此，利用多元迴歸分析，將候選人是否具有派系、政黨背景的變項，用虛擬變項的方式，替入一般型式迴歸函數，可得多元迴歸模型為：

$$Y_i = a + b_1 X_{1i} + b_2 X_{2i} + e_i$$

$i = 1 \dots N$

$N$  為樣本數，表示市議員候選人參選人數 (1998 年市議員參選人數 90 人， $N = 90$ ；2002 年市議員參選人數 109 人， $N = 109$ )

$Y_i$  表示每個候選人得票率

$X_{1i}$  表示候選人是否具有派系屬性 (「有」派系背景者  $X_{1i} = 1$ ，「無」派系背景者  $X_{1i} = 0$ )

$X_{2i}$  表示候選人是否具有政黨黨籍 (「有」黨籍者  $X_{2i} = 1$ ，「無」黨籍者  $X_{2i} = 0$ )

$a$  常數，為迴歸平面在  $Y$  軸上之截距

$b_1$ 、 $b_2$  為偏迴歸係數，其所反射的意義，為一個自變數變化部分之效應

$e$  表示迴歸分析的誤差值

本研究對迴歸方程式的測定，除了以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B 之估計值），來說明自變數的變化，所引發依變數的變化外，同時亦以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說明各自變數標準差的變化，所導致的依變數的標準差的變化量，藉以比較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力大小；同時也將以  $R^2$  值的大小，來說明本模型對依變數變異性的解釋能力。並以 F 檢定方法，檢定本迴歸模式依變數與自變數之間是否有顯著性統計關係存在，以瞭解自變數對依變數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力。

### 第三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分析模型中，假設派系與政黨為影響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變數，為使虛擬變數代入以上效應函數中，必須確認候選人是否具有派系或政黨。在政黨方面，係以候選人是否具黨籍身份參選為依據；至於派系變數，為確認候選人是否具有派系屬性，仍依據筆者深度訪談並請熟悉台中市地方派系人士校對指正，交叉分析後所得之結果，以 S P S S 透過多元迴歸的統計檢驗程序，分別探討此兩變項與候選人得票率在市議員選舉中的關聯性，其統計結果如【表 5-3-1】。

如【表 5-3-1】中數字顯示，可求得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的得票率估計迴歸函數，1998 年以及 2002 年分別為：

$$1998\text{年} \quad Y = 0.023 + 0.035 X_1 + 0.045 X_2 + e$$

$$2002\text{年} \quad Y = 0.030 + 0.034 X_1 + 0.039 X_2 + e$$

【表 5-3-1】：台中市 1998 年、2002 年派系與政黨對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影響力相關及迴歸分析

自變數	1998 年		2002 年	
	B	BETA	B	BETA
派系	0.035 <sup>***</sup> (0.008)	0.366 <sup>***</sup>	0.034 <sup>***</sup> (0.010)	0.281 <sup>***</sup>
政黨	0.045 <sup>***</sup> (0.008)	0.461 <sup>***</sup>	0.039 <sup>***</sup> (0.009)	0.378 <sup>***</sup>
常數	0.023		0.031	
R	0.621		0.526	
R-squared	0.386		0.277	
Adj-squared	0.372		0.263	
F 統計值	27.346		20.294	
F 顯著水準	0.000		0.000	
註：1.括弧內為標準差				
2.***, **與*分別代表 0.01、0.05 與 0.10 的顯著水準				

迴歸分析結果所呈現的意義，分析說明如下：

一、1998 年政黨輪替前，派系與政黨兩個變數與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的得票率，均呈現正相關，且皆達 99% 的信心水準。派系與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具有百分之三十七左右的解釋變異的能力（ $A dj\text{-squared} = 0.372$ ）。即在 2000 年的政黨輪替前，市議員候選人具有派系與政黨背景者，對於候選人得票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且呈現正向相關。換言之，候選人具有派系或政黨背景者，得票率越高。

二、2002 年政黨輪替後，派系與政黨兩變數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仍達到 99% 的信心水準，顯見政黨輪替後，派系與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依舊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且呈現正相關。不過，對於政黨輪替後的 2002 年第十五屆台中市市議員選舉而言，派系與政黨解釋候選人得票率之變異的能力降低（ $A dj\text{-squared} = 0.263$ ），顯然本模型還有不少影響候選人得票率的因素未被納入分析之中，諸如候選人個人特質、形象與基層服務的成效等，以致本模型解釋力略顯不足。

三、以 1998 年、2002 年兩次選舉，派系與政黨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B 之估計值加以比較：

派系在 1998 年統計結果，B 之估計值為 0.035，2002 年 B 之估計值為 0.034，呈現下降的情形，可由此觀察出隨著 2000 年的政黨輪替，候選人是否具有派系背景，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呈現下降的趨勢。實證分析結果，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

至於政黨變項，從兩次選舉統計結果可得知，1998 年 B 之估計值為 0.045，2002 年 B 之估計值為 0.039，可以看出候選人是否具有政黨背景，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程度已逐漸減弱。顯見縱然 2000 年大選後有多個新興政黨成立並投入選戰，但是在基層選舉上所強調的個人領導特

質、政策主張、競選策略、棄保效應、個人式的基層經營與中央或地方的執政黨施政表現，甚至政黨內外的整合程度等，諸多因素之影響力有逐漸增強的趨勢。

四、再比較政黨輪替前後兩次選舉統計資料，觀察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得知：1998 年派系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小於政黨的標準化迴歸係數（派系 BETA = 0.366、政黨 BETA = 0.461），顯示在政黨輪替前，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程度，政黨因素的影響力大於派系的影響力。2002 年派系的標準化迴歸係數亦小於政黨的標準化迴歸係數，派系的 BETA 值與政黨的 BETA 值同樣呈現差距（派系 BETA = 0.281、政黨 BETA = 0.378），可以發現，不論是政黨輪替前後，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皆大於派系的影響力。

基於上述分析的結果，本研究發現，就派系與政黨兩個變數來分析影響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高低的因素，顯示出本研究模型在 1998 年政黨輪替前比 2002 年政黨輪替後更具有解釋力。而 2000 年的中央政黨輪替前，候選人的得票率與候選人是否具有派系或政黨背景，皆呈正相關；政黨輪替後，政黨與派系對候選人的正向影響力皆轉弱。並且無論政黨輪替前後，以台中市的分析資料而言，政黨的影響力始終大於派系的影響力。故本研究假設一、二、三均成立。

從政黨輪替前後台中市議員的選舉得票率觀察，1998 年派系得票率為 47.86%，2002 年派系得票率下滑為 33.13%，除了候選人本身派系色彩逐年模糊化並難以界定外，經濟環境的困境也使得具有明顯派系色彩的候選人，在考量競選必須大量動員與投入所費不貲的財力，自然減弱參與政治場域的企圖。政黨在選舉時，也為了將基層版圖極大化，更習於提名現任者，2002 年的市議會，民進黨除謝明源轉換跑道外，現任當選率甚至高達 100%。就整體第十五屆市議員的 71.74% 高額連任比率而言，現任議員因擁有服務績效與選區知名度而佔有較大的優勢。可見在高都市化的台中市，各政黨、派

系與候選人在既有的人際網絡上，為了爭取大量中間選民的支持，政黨與派系的影響差異漸漸縮小，政黨間意識型態的界線逐漸模糊，選民投票之關鍵已開始從政黨與派系兩個選項轉而偏向候選者個人特質、形象、口碑或政見議題為考量，因此基層選民受到不同黨派候選者的吸引而跨越黨派認同的界線也越普遍。